

海日樓札叢

沈曾植◎撰

錢仲聯◎輯

外一種

海日樓札叢

沈曾植◎撰

錢仲聯◎輯



外一種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海日樓札叢/沈曾植著;錢仲聯輯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.3

ISBN 978-7-5325-5150-7

I. 海... II. ①沈... ②錢... III. 雜著-中國-清代
IV. Z429.52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007890 號

海日樓札叢

(外一種)

沈曾植 著 錢仲聯 輯

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、發行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)

(1) 網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1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網網址: www.ewen.cc

長華書店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刷

開本 850 × 1156 1/32 印張 15.625 插頁 6 字數 274,000

2009 年 3 月第 2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—2,300

ISBN 978-7-5325-5150-7

I·2079 定價: 38.00 元

前言

錢仲聯

這裏刊行沈曾植的遺著兩種——海日樓札叢及海日樓題跋。

沈曾植（一八五一——一九二二），字子培，別字乙盦，晚號寐叟，浙江嘉興人，做過清朝的官吏，撰述頗富（參見王遽常沈寐叟年譜）。他同當時有些上層士大夫一樣，在政治上，主張新政，提倡洋務，擁護君主立憲；在學術上，要求探索西方科學，研究西北、南洋的邊陲和域外的地理等等，主張『中學爲體，西學爲用』。但他的思想體系還是屬於封建儒家正統；他在政治上最基本的、最本質的要求，還是要一個能够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皇帝。海日樓札叢及海日樓題跋是他治學的札記和書畫碑帖的知見錄，雖不能直接地反映沈氏的政治思想和學術思想的主要內容；但是，我們在這裏可以多少看到沈氏的一些思想傾向和治學方法，以及這一時期的學風和有關於哲學、歷史、地理、文學、藝術等方面的一些研究材料。

海日樓札叢共八卷，大致可以分爲五個部分，是沈曾植的讀書筆記，它所涉及的方面很多，重點在於史、地和音訓之學。

札叢的第一部分是經學。

在這裏，屬於考證方面的，如說韓奕詩『其追其貊』之『追』，用追、狄音和、翟、狄通用，翟從佳聲，佳、追同部，證明『追』即是『翟』；說釋名『拜于丈夫爲跌』，『跌』乃『跋』之誤；關於韻集、廣韻的考證，不同于王國維之說，而可以互參。這些都是恪遵乾嘉學者的治學途徑的。至說國語韋昭注的『九黎，黎氏九人同位』和尚書呂刑的苗民，結合西洋史例，以爲『殆可稱爲共和民治』，則已突破了漢學家說經的藩籬。他如理論的闡釋，『闕人』一條，言儒家重恥辱之義，尤見心得。

札叢的第二部分是歷史與輿地。

沈氏在四裔輿地方面，是用力最早而收穫較多的。他所作唐闕特勤碑、突厥苾伽可汗碑、九姓回鶻受里登囉汨沒密施合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三跋，糾正新舊唐書的錯誤，並通突厥及古今蒙古語譯音的異同。當時俄國學者曾譯以行世，西人著作涉及蒙古史事的，往往徵引其說。又嘗考定元經世大典西北地理圖爲回回人所繪，並考證其傳寫的錯誤，參稽羣書，證明今地，寫成元經世大典西北地理圖考。清末正值南洋多事，他就元汪大淵書，參證新舊各圖，用以考見南洋各島自唐、宋迄清的航路，並考出西人所建商埠，也就是古代商業集中的地區，寫成島夷志略廣證一書。

有關遠古地理的研究，他也多所發明，曾以佛經證穆天子傳。這方面的學問，在札叢中也保存了不少零星的材料。例如考史記李將軍傳所載李陵所走的龍城道，是唐以前絕幕之道見于史載之最詳

者；指出馬援已嘗言由滇入越的水路，在元人開道之前；考魏略的劭提，即魏書鮮卑秃髮烏孤傳的壽闡；魏書蠕蠕傳的天山，即畏兀兒祖居和林川的天靈山；隋書的獬刺國即布拉特，阿得水即額爾齊斯河的下游；新唐書的室韋即索倫；元史欽察之地即喀山，會通河在金、元之際民間已自開運；指出水經注葉榆河的錯誤；雷轟海是裏海而非鹽海；據道書以參證地志，知潯、閩二地各有霍山都稱南嶽；都是發前人所未發。

此外，如關於南詔史的考證若干條，對雲南史地的研究有幫助；考證四裔年表的散者和即耶律大石，對西遼史的研究提供了材料；『金史宗浩傳北方兵事』、『撒里部陀括里』等條，關於部落地理，考訂綦詳。又如考王延昌使高昌記稱捻厓天子和五代史所稱金山白衣天子，天子乃漢語太師音轉；據蒙古源流和明史以考訂明史紀事本末所載三小王子事；謂清初五衛之稱即巴林、嚕特二部舊稱等，也多所荊獲。

至于據扶南土俗、佛國記、太平寰宇記、宋史、諸蕃志、職方外紀、瀛寰志略、海國圖志、異域錄等以考訂域外古今地名的，更爲沉沉夥頄。他不通外文，但能採用對音、互證等方法，作出了比較正確的結論，在這一方面做了很多筆路藍縷的工作。

札叢的第三部分是哲學、宗教與醫學等。

沈氏早年潛心義理之學，晚而融通梵釋。札叢中有關儒學的闡說雖少，但有所見，如說『象山從宇宙兩字悟道，所悟之道爲太極，極似華嚴法界觀，終不肯說物字，由今日言之，可謂之爲儒家之唯心論』；說『今日儒門刻急，天下豪傑，將望望然去之』；說『老氏道德仁義之說，蓋古易家微言，或歸藏玄旨』等；是融通儒、佛、老與古今而爲說的。

沈氏治佛學，開始在四十歲前後。光緒末，游日本，得大藏經全帙回國，所學益勤。但他所學不專一宗，于華嚴、天台、三論、慈恩、禪、密諸家，無一不深入探討，不爲拘墟之見。于儒佛異同，更能會通。這裏所收有關佛學史考證的，如說魏略所云臨兒國即王舍城，魏略所引浮屠經爲歷代三寶記的作者費長房所未曾見；指出舍利弗問經與宗輪論敘述大衆部、上座部的歧異，謂宗輪疏對於大衆部的片面評述是『加誣過實』之詞；考證密宗萌芽在龍樹之前等，都是前人在佛學研究領域中所沒有觸及的問題。

又，關於禪宗史的部分，刑見更多。如說佛大先即是佛陀斯那；少林禪業開自佛陀，在達摩之先；訂正傳燈錄以佛大先與達摩同學于佛陀跋陀之誤；據圭峯禪門師資承襲圖、贊寧宋高僧傳以考證禪宗諸祖；謂傳燈錄所記禪宗列祖是合付法傳與薩婆多部記爲之；考鳩摩羅什所傳禪法，與佛陀跋多羅所傳禪法同出于薩婆多部；謂達摩出于用力在文字的薩婆多部而不立文字，是救弊扶偏之意；指

出禪宗四、五、六祖的分支是唐人舊說，以正傳燈錄定于一尊之非；而有關南宗七祖荷澤神會的闡揚，自錢謙益以後，到沈氏才把這問題提出（錢說見錢注杜詩秋日夔府詠懷奉寄鄭監李賓客一百韻注），而胡適寫荷澤大師神會傳，自矜爲發千載之蒙，可說是誣妄之尤（胡適寫神會傳，別有其政治上的反動目的，此不具論）。沈氏這種以實事求是的治學方法治禪學，是宋、元以後空疏庸陋的狂禪所不能夢見的。

其次，有關佛學理論方面的，如謂小乘極深研幾，影響大乘；空處天即空宗之空，識處天即唯識論之識；謂提婆破外道，世親破本宗，法相應機，隘于法性；謂華嚴、方等、般若、法華、涅槃等大乘五部經典，彌勒宗皆有論釋，惜其學蔽于唯識十師，後世無能發揮諸論宗綱者；謂法相是論藏之說，法性乃經藏之說；謂禪學馬祖會無，龍樹宗也；曹洞知有，無著意也；是皆能融通各宗以立論。

其次，有關融通儒、道兩家言以論佛學的，如謂密宗慧門十六尊是乾道成男，定門十六尊是坤道成女；謂成實說性，即是儒家之習；謂發智論說風不吹、河不流、火不燃、乳不注、胎不孕、日月不出不沒、染淨自性住不增不減等邊執見，即莊子『飛鳥之影，未曾動也』之意，亦甚精闢。

至于針砭僧徒的話，如謂有世間法而後有出世間法，僧徒不識世間心，何從轉世間心理爲出世間心理，亦具卓見。

此外，還有一些考證佛門零星故事的，如謂佛寺壁畫出于西天，後世門神亦出佛家；辨九子母與

鬼子母非一；考證密宗成就劍法與唐人劍俠小說的關係，爲今天研究唐傳奇文學者提供了嶄新的資料。儘管近人在佛學研究方面的成就已超出沈氏之上，而沈氏所得，特別是有關佛學史的考訂方面，確是反映了清末佛學研究的水平。

沈氏不僅精通佛學，同時對道藏也涉獵匪淺，可以繼武宋濂。其研究成果，保存在札叢中的，有的是有關道教史本身的探索，如考訂五斗米道的來源，章醮的來源，太平經的源流，鮑靚的生死，道教各派的相互關係，正一教杜京產與真誥楊許的關涉等；有的可以補史傳之不足，如考太平道與東南豪的關係；如考道教徒盧竦之舉兵，事在閩中；指出苻融、姚萇、司馬道子等殺戮道教徒，是對黃巾之事有戒心，我們正可以從這裏看出農民與封建統治者的利用道教，迹同而心異。

沈氏有時還用儒、佛之書作旁證，考中黃太一之目起自緯書，三洞本迹之說襲自天台宗，五千文解節中經序近于外道神我之說，智梭以佛經潤色道經，而引用甄正論、辨惑論、二教論、笑道論等佛家撰述以發道教徒偽造道經之祕覆等等，都有翔識。至論道教中之西域外道，則有助於研究民族思想史的參考。

又，其他宗教方面，如論明教即回紇末尼之遺，元史文宗紀之朮忽乃宗教名稱，也是前人所未經拈出的。

醫學方面，他對王叔和的時代與著作的考證，對吳普以來諸醫家醫書的考訂，都有助於醫學史的研究；至論榮衛並以氣言，指出後人專以衛屬氣、血屬榮之謬，則可供醫理研究方面的參考。

札叢的第四部分是文學。

沈氏是同光體的主要詩人之一，早年用力於張籍、李商隱、黃庭堅，而不輕易詆斥明七子；中年以後，泛濫百家，上溯魏晉，曾主張學詩要通元嘉、元和、元祐三關。其詩論與詞論，語多精闢造微。其論詩，如謂曹操短歌行意指孔融諸人；指出陸機樂府十七首的現實意義，可以反證近人以陸機詩爲形式主義作品的錯誤；如評陶淵明榮木、形影神、歸園田居、示周掾祖謝、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、和劉柴桑、于王撫軍座送客諸詩，指出陶詩感慨佛鬱、意氣奮迅的一面，與朱熹、龔自珍、潘德輿、魯迅諸家所見略同；至論詩與繪畫、宗教的相互關係問題，更可以給研究我國古代文藝史者以新的綫索，他說：『密宗神祕于中唐，吳盧畫皆依爲藍本，讀昌黎、昌谷詩皆當以此意會之。顏、謝設色古雅如顧、陸，蘇、陸設色如吳可、伯時，同一例也』；論開元文盛，也以文學與書法繪畫等藝術作聯系考察，指出它們『燕華、竺變通之用』，『爲通變復古之中樞』。這些見解，顯然不是舊時代一班的詩文家所能道的。

其論詞，謂李清照詞乃閨閣之蘇辛，謂姜夔詞略如詩之有江西派，詩與詞幾合同而化，確是拈出

了兩家倚聲風格繼承變化的特點；謂吳文英詞未得爲雅詞勝諦，而爲南唐、北宋詞者概予排斥亦爲非是，同時批判了朱祖謀與王國維兩家的偏見；謂『五代詞促數，北宋盛時暉緩，皆緣燕樂音節蛻變而然，即其詞可懸想其纏拍』；辨陳師道比蘇詞于敦坊雷大使舞以爲非本色的錯誤，能結合樂舞作落實的研究；至于辨明蘭畹集是宋詞而非唐人集，解釋杜詩劍器渾脫是舞曲之名，雖屬于名物的考證，也是發前人所未發，有益于多聞。

論詞變爲曲的關鍵，由于『字少聲多難過度』，柳永已開其端，如果沒有大晟府的整齊，周邦彥的嚴謹于持律，則詞化爲曲不必待元代；以芝庵論曲（金、宋間人著）所用術語，與張炎詞源、陳元靚事林廣記相參證，窺見曲家詞家承接之迹，從而闡明詞曲遞變之因；又從顧仲瑛製曲十六觀的點竄張炎詞源，證明曲是慢的演化。這些發現，給詞曲史研究者開拓了門徑。

有關樂律方面的考證，如以七曜配七音，用佛典七曜攘災訣以證宋史律曆志；用陳瑒樂書所載胡調七調與婆羅門曲調止六調相參證，說明陳瑒之說影響僧徒，從龜茲樂說明齊、隋至唐樂相變的關係；這都可證成古代華、梵文化溝通之理。

他如從姜夔樂議推知宋世樂曲分配四聲之法，說明平聲可爲上入，和樂家喜輕清而不利重濁；說陰平聲爲徵聲等等，都是他研究音韻的心得。至謂一聲一字則雅樂不永言，字少聲多則俗樂難過度，

兩義相違，問題的提出，也是有啓發性的。

札叢的最後部分是書法。

沈氏早精帖學，得筆于包世臣，壯年嗜張裕釗；其後由帖入碑，融南北書流于一鑪，錯綜變化，純以神行，談藝者推爲大家。札叢中保存一些材料，雖不多，但持論往往深入精微。如謂『禮器碑細勁，流沙木簡中「始建國」、「折傷薄」、「急就章」皆此體』；謂從金文中的楚人書，到校官碑，到王大令，吳會書法，形成一種風氣；謂李斯亡篆以簡直，中郎亡隸以波發；謂夏承華山諸碑，皆紹中郎分勢，刻意波發，伯英府君帖收平爲側，波發之作用已生，其啄掠向背，與中郎分勢相應，上承史游，下開索靖；謂『點畫即波發之變化』，用中郎隸勢語、筆論語以證夏承諸碑，用書法所稱鍾太傳書語以證明蔡氏分法即鍾氏隸法；謂鍾太傳王基殘碑，使轉筆勢，體現十二種巧妙，楷法之妙，八分之潤，故知元常老骨，定非樸質；論『急就章是古隸章草，月儀是八分章草，右軍則今隸章草』；論『右軍筆法點畫簡嚴，心儀古隸章法。歐虞爲楷法之古隸，褚顏實楷法之八分』；從展盛之祕，悟出大令草書開率更，旭素奇變又皆從率更出；謂『六代清華沿于大令，三唐奇峻胎自歐陽』，比之于佛氏空有二宗，禪門能秀兩派；論南朝書法，分爲寫書、碑碣、簡牘三體，分析行草用于寫書和用于簡牘的殊異；考證洛神賦是碑刻而十三行是墨跡的差別；以及其他論書畫融通之理，論行楷隸篆遞變之迹等等，都能擊肌

分理，以治學方法談藝，可以補包世臣書論所未及。

海日樓題跋共三卷，凡三部分，首書籍板本，次碑帖，次書畫真跡。全書重點在第二部分。

題跋的第一部分是書籍板本。

這一部分，不僅有關板本目錄之學，作者具有自己的見解，訂正前人的誤說，比勘各本的異同與優劣，探索某些本子的原來面目，特別是有關黃山谷諸集的跋文，原原本本，如數家珍；而且，其中也保存了一些沈氏在學術上的見解，如關於釋名之以音言義，對王弼注老子的評價，闡述姚鼐的詩歌成就等就是。

題跋的第二部分是碑帖。

這一部分，融會各篇，可以系統地成為沈氏研究碑帖的一家之學。如禮器碑跋中謂壽碑碑估覆本，未嘗不粗存形質，然不得為考證之資，關鍵在於有來歷與無來歷之別；張黑女墓誌跋中指出它筆意風氣的淵源所自；于張猛龍碑、高湛墓誌、敬使君碑、禪靜寺剎前銘敬使君碑、北周碑刻諸跋中，詳論北碑的藝術風格和時代變化；于多寶塔碑、李紳龍宮寺碑諸跋中，則闡述了唐碑的源流與體尚；帖部諸跋，辨別蘭亭各本以及閣帖的源流，亦多具荊識。

題跋的第三部分是書畫真跡。

這一部分，頗見沈氏對古典藝術的修養。如示人以辨析祝枝山草書真偽的法門；對文徵明草書的正確評價；于金劉貫道畫金顯宗西狩探梅圖軸跋中，旁證章服的制度；于元陳仲美金山圖卷跋中，訂正畫史彙傳所載時代的錯誤；于明劉定菴山水卷跋中，指出明代嘉靖、隆慶以前詩文書畫的時代風格；于明唐六如梅谷圖卷跋中，評價唐寅畫，別具隻眼；于明文衡山養鶴種松圖卷、張夕庵山水卷、宋芝山晴江列岫卷諸跋中，標舉古韻與古法，批判麓台、石谷、南田末派之失；于謝退谷觀生山水卷跋中，指出藝林真脈和今後融化中外的方向。所有這些，都可給中國古代藝術史的研究和寫作者，提供很重要的參考意見。

以上是我們對札叢及題跋的一些初步的探索。至于沈氏一生治學的途徑，他的學生王蘧常有這樣幾句話：『先生之學初以義理備實用，既由實用反自然，蓋有三變，而每變益進。壯歲由理學轉而治考據，此一變也；及服官政，又由考據而求用世，此又一變也；晚年潛心儒、玄、道、釋之學，此又一變也。』（沈乙齋先生學案小識）稽考沈氏各個階段的學術思想實際，這一總結基本上是與之相符合的。而沈氏的學術成就，近人王國維又作了這樣的概括：『先生少年固已盡通國初及乾、嘉諸家之說；中年治遼、金、元史，治四裔地理，又爲道、咸以降之學，然一秉先正成法，無或逾越。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，政事之利病，必窮其源委，似國初諸老；其視經史爲獨立之學，而益探其奧突，拓其區宇，不讓乾、嘉諸

先生；至于綜覽百家，旁及兩氏，一以治經、史之法治之，則又爲自來學者所未及。」（觀堂集林卷十九沈乙盦先生七十壽序）王氏的這個概括，雖然對沈氏的學術面目作了一些基本的鈎勒，但對沈氏的整個評價却有過分推崇之處。例如在札叢的經學部分裏，沈氏強調畏神服教（『夏道尊命』條）、『上者專制，下者順從』（『專制』條）、『君者，乾元也』（『貞吉之象志在君』條）、『湯、武革命，乃革夏、殷亂民之命，非革夏、殷暴主之命』（『辛亥之際』條）等，都是站在封建統治階級立場上說的話，反映了沈氏根深蒂固的儒家正統思想，而王國維的概括顯然是未能說明這一問題的。

有關札叢及題跋的纂輯經過，以及分類編排的體例，都已在各該跋文中提及，這裏不再複述。但也由于纂輯者的水平和參考書籍的限制，這一工作做得還是不够細緻完善的，竭誠希望海內學術界的指正，俾得于重版時修訂。

一九六二年元旦，于上海。

海日樓札叢(外一種)總目錄

前言

海日樓札叢八卷

海日樓題跋三卷

插頁：沈曾植手寫海日樓札叢原稿一頁

海日樓札記

紹虞

